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 试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
读词典引起的思考
《哲学大辞典》编纂研究专辑
- 《现代法语词典》试析
专书专辞典的释义及其他
《论衡索引》序
- 《说文通训定声》的词义研究
黄生《义府》评介
《简明吴方言词典》评述

辞书研究

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总第四十二期)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二八六号

定价五角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四五七号

辞书研究 编辑部编辑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辞书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七年三月

1	王人龙等	试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
6	钟 稔	读词典引起的思考
·《哲学大辞典》编纂研究专辑·		
13	罗 禹	编纂大型专科辞典的可贵探索
17	徐庆凯	《哲学大辞典》词目的完备性
24	杨祖希	《哲学大辞典·外国哲学史卷》编纂构思
32	张良一	《哲学大辞典》附录的特点
·我和词典·		
39	蒋星煜	从虔诚的读者到编写者、推荐者
44	林 菁	《辞海》和《经籍纂诂》对我的影响
46	宋永培等	按照词义的形象特征整理引申系列
50	章 也	合音词、“反切成词”及其在词典中的释义
57	林海鑫	简论辞书的内在联系
63	戴木金	专人专书辞典的释义及其他
71	黄建华	《现代法语词典》试析
·杂 谈·		
80	于 石	人间需要好辞书
81	杨宗义	从“黏膜”与“粘膜”谈起

82	王 力	《论衡索引》序
84	林寒生	《说文通训定声》的词义研究
93	赵伯义	《尔雅》亲宫器乐天地丘山水释例
99	钱剑夫	黄生《义府》评介
107	张振兴	《简明吴方言词典》评述
115	王思圻	《汉语外来词词典》管窥 ——评该词典中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
122	娄自良	试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一卷)
127	郭定泰	苏联科学院《俄语词典》第二版读后
134	葛志福编译	约翰·威瑟尔斯的《初学者小词典》
· 编写一得 ·		
35	中 行	略谈大型专科辞典的系统性
· 释义探讨 ·		
139	陆 昕	“所”字释义
141	李志兵	“车骑”非“车马”辨
· 资 料 ·		
145	李 鉴	1985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五)
· 新词新义小集 ·		
156		[小气候][打小报告][仿冒] [空调][星火计划][彩照]
补白	《疑难字词辨析集》出版(23) 《国内工具书指南·辞书部分》出版(126)	

试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

王人龙 赵福成

辞书作为一种供人查阅解疑释惑的工具书应起典范作用，这个作用在编纂中主要体现在词目的选择和对所收词目的释义上。辞书收录的词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术语。在现代辞书(特别是门类日益齐全的专业性辞书)中，术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它们作出正确统一的释义，就不仅反映某领域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也是辞书应有的典范作用的体现。术语是随着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据统计，目前在发达国家的语言中有90%的词汇是科技术语，这是科技进步使得大量普通语词被赋予准确的科学定义后成为专门术语的结果。在当今新技术革命时代，术语更是成倍增加，以计算技术词汇为例，1974年出版的《英俄计算技术词典》收词24,000条，而10年前的第一版只有12,000条；1977年出版的《英汉计算技术词汇》有14,000条，1982年修订版则猛增到近40,000条。术语的激增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但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这些数量很大(其中有些是以不同形式表述同一概念)的术语，又给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间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术语标准化，需要辞书这种集中汇

编标准化成果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着手开展术语标准化工作。1950年5月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制订了《统一学术名词工作的初步方案》。几经变迁，现在先后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受国家标准局领导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从不同的侧面组织和协调全国术语的统一和标准化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将为编纂高质量的辞书提供科学的依据。

辞书编纂的历史虽然已经相当久远，然而辞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十分年轻，特别是它与标准化的关系过去更是冷门，谈不上系统研究和实践。因此，必须加强研究和总结，以建立并完善这门学科及其体系。

二

现代的标准化工作是工业大生产的产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开展系统研究和进行实践，即促使标准化从自发转为自觉的工作，则是最近几十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我国于1983年颁布的第3935号国家标准(GB3935.1—83)中指出：“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由于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标准化工作已不仅在工农业、商业和工程技术等方面显示出效果，而且已经远远超出这些范畴，涉及文化、教育、管理，甚至安全、环保、术语以及辞书编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术语的标准化是对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之标准化的必要补充，因为它提供的标准称谓，对表现被标准化了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术语的标准化，把表征事物或思想的各种本质属性的

概念体现在一个名称之中，从而确保标准化后的概念的完整性，并通过解决同义词问题，消除歧义，避免信息消失，促进科学文化的交流。

各类辞书汇集了各种术语，通过简练扼要的释文和按一定的方式编排，供人们检索查阅以获得确切的解释。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四化建设的需要，人们越来越渴望有更多更好的、对术语概念给与相互一致即规范化、标准化解释的各类辞书，以满足工作、生活、学习和交往的需要的同时有充分的共同认识。

三

辞书编纂工作有其特点和规律，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标准化。但是，看来这项工作目前还停留在编纂人员的局部经验之中，还未作系统的研究和贯彻。

词典收录的词目，特别是其中的术语，应是规范化的、标准化了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术语比较混乱，主要表现在一个概念有多个术语和不同的定义。这种混乱在不同程度上波及辞书。同一种疾病，一家电视台称“获得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一家通讯社则叫“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报纸则索性移植海外称呼“爱滋病”，现在趋向称为“艾滋病”；中国大陆叫“计算机”、“软件”、“终端”和“磁盘”，而港、台等地区则称“电脑”、“软体”、“端末”和“磁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至于一词（术语）而定义各异或定义过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医所指的“肾”与西医所指的“肾”，其含义却不同，前者范围广泛，后者仅指解剖学上的一个人体器官。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人类器官的移植变为可能，但许多移植器官须在人死瞬间取得，可是如何判断死亡，死亡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实际问题就使得“死”或“死亡”这一通用语词成为法医学上的专门术语，要求其定义准确无误，否则会引起医疗诉讼。“死”过去通常以“失去生命”或“心脏

停搏”为依据，但随着医学科学的进展，现已可安装人工心脏，使病者免于死亡或延缓死亡，于是有些发达国家则以“脑功能完全丧失”为死亡鉴定。术语的歧异表明术语标准化的必要，术语的时代性变动则要求标准化的发展。各类辞书对术语及其定义的标准化的意义和作用。

辞书学和辞书编纂部门自身的术语，排检和格式等也还存在应当标准化的问题。“辞典”与“词典”、“词条”与“条目”、“词头”与“词目”等等的含义是否一样？否则，区别又在何处？“大词典”、“词典”和“小词典”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除收词数量不同外，是否还有其他划分标准？各种辞书没有共同的、标准化的检索方式，有用汉语拼音的，有用四角号码的，有用笔划的，有用部首的，同用部首法的却又分法不一的。这种情况使得不少词典在所采用的检索法之外还附录乃至另外印行别的检索法作为补充，使词典扩大篇幅，增加读者的负担，而若不如此，则读者每用一种词典就得学会一种检索，即给读者以不必要的烦难。

四

标准化的目的是，以最合理的概括形式将纷杂的情况加以区别和归类，从理论上阐明各自的特点，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工作质量，达到最佳效果。

辞书工作的标准化也就是基于这一原则来考虑的，它大体有如下内容：

- (1) 编纂的原则与方法；
- (2) 编纂工作中的术语；
- (3) 种类的划分；
- (4) 规模的划分；
- (5) (按种类和规模的)词目选择要求；
- (6) (按种类和规模的)释文撰写要求；

- (7) 正文编排的规定；
- (8) 图表、符号和格式的排列要求；
- (9) 文献收录注明出处的要求；
- (10) 检索方法的要求；等。

只有通过总结辞书编纂工作古今中外的实践，制订出原则的标准，并在施行过程中加以补充和完善，才能更有效地在辞书编纂中开展标准化工作。当然，作为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能作原则指导，就每一部具体的词典而言，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标准指出的原则加以具体化。这样，辞书编纂工作就有可能取得更佳的社会效益，真正起到“典”的作用。

五

为了使辞书编纂规范化和标准化，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在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37) 下专门设立一个第二分委员会来负责辞书编纂的标准化工作。在 TC 37 制订的各种标准中，直接与辞书编纂有关的有：ISO 1951—1973《分类定义词汇的词典编纂符号》以及四个推荐标准可供参考与借鉴，即：ISO/R 639—1967《语言、国家与权威典籍代号》，ISO/R 704—1968《术语标准化的原则与方法》(或称《命名原则》)，ISO/R 860—1968《概念和术语的国际统一》和 ISO/R 1087—1969《术语词汇》。

我国的第二分委员会即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4月，其任务就是，就辞书编纂的标准化开展学术研究，并制修订有关标准。这一工作在辞书编纂出版界的鼎力相助和积极参与下，定将有助于辞书编纂标准化取得较快的进展。

读词典引起的思考

钟 侵

最近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逆引词典》，引起了我不少的联想。

因为自己搞过不少时间的词典，对词典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好感，翻阅词典既是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又是一种变换脑筋的休息方式。而这中间最有趣味的，大概要算对各种词典进行比较这样一项活动了。比如说，在阅读汉英这一类双语词典时，把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小型汉英词典同过去的以及国外的汉英词典进行比较，不但可以从收词和译释方面的异同中寻到乐趣，还可以在编排方法以及某些语言学观点方面发现各家之长。甚至可以说，读词典时引起的思考往往比自己编词典时进行的思考还要深，还要广。

我们知道，语言词典的科学性、权威性，对词典所载的那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影响极大，而词典是否具备权威性，不完全取决于编词典的人的本事。如果一种共同语在形成的过程中就缺少了许多应做的工作，词典的编者最多只能提出些看法，提供些资料，做些补救工作。设想一下，谁能独立一下子解决那么多的大问题呢？

举例来说，词的界线问题。世界上那些权威性的大型（或中

型)的词典,在词典的根本问题即什么是词、是词就应标定词性这个问题上,困难并不大,遭到的批评抨击也不厉害。那是因为,那些民族共同语(例如法语、英语、俄语、德语等)在诸如什么是本民族语的词、是词就在行文中单写(词儿分写)并标注出词性、词的基本语法形式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达到了普遍的、一致的和全民族的认识。汉语普通话这个共同语就不然,在上述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认识仍不统一,甚至还有争论。但我们不妨说,现在所编的各种汉语词典,不论观点是否一致,都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都一起在推动共同语的完善和发展,最终必定会在竞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真正具有权威性的、代表民族共同语的词典来。^①

让我们来看个例子。比如“肉”字,《现代汉语词典》有四个义项。第二个义项是:“某些瓜果里可以吃的部分:桂圆~,冬瓜~厚”。这个例子不说明编者对“桂圆肉”是词非词的看法,因为这本词典既允许词进入词典,也允许小于词的字和大于词的语进入词典,而实词又不注词性,矛盾避开了。但是搞语言(词的界线)研究的人,包括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人,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处理法。“肉”是自由词,“牛肉”“羊肉”“猪肉”是不是词?若是,那么“兔

① 这同文字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从秦始皇起,就知道文字要统一,要使用强制的手段。这是统治国家、扩大本民族语的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让各种思潮好晃了一阵子(草率地公布简“展”为“巳”之类那一次,最具有破坏力,因为它动摇了人们对原本很好的、五十年代搞的那些简化字的信任)。现在处理语言文字问题时还有些余震之感:该统一的文字,主管机关不统,让娃娃去查抄;法定的简体,在宣传机关的电视、电影等等东西上面,公然可以不执行,据说为了照顾海外。海外当然要照顾,但如果同时也面对海内,甚至兼及某些跟着我们推行我们的简化字的国家,照顾的重心应如何放,难道还不明白吗?同文字的强制推行相反,语言方面的问题,则多半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包括象推广普通话那样的工作,都只能靠引导,靠说服;那些带学术研究性质的问题更不能人为地去统,要让人自由探讨,自由发表见解。学派多几个,没有坏处。这和统一中小学语文的语法体系并不矛盾,中小學生穿制服,大学生就不必。这都是些题外话。

子肉”“天鹅肉”“火鸡肉”都算词吗？“桂圆肉”出成了名词，那么“荔枝肉”又何尝不够资格？还有什么肉象是词的？类似的还有末尾带虫、鱼、树、木、花、石、菜、油等等的一大堆。这样的问题，教师备课时很想有资料参考一下，搞语言科学研究的人更希望有个简便的手段可以查明。

这时候，“逆引”就能提供不少参考资料。查《汉英逆引》，除单词“肉”外，还列有22个“×肉”或“××肉”的词，都注有词性。看来因词典篇幅有限，没有收更多的同类词条。查四川出版的《现代汉语逆序词目》（暂称《现汉逆序》），有26条，有“×肉”（如：肌～）、“××肉”（如：俎上～）和“×××肉”（如：有血有～），还有“×肉××”（如：酒～朋友）和“××肉×”（如：心惊～跳）。不过，在这一点上，《现代汉语词典》的出词法较为妥当，“牛肉”“羊肉”“猪肉”不单出，“桂圆肉”也是作为例释，可看成词组。《汉英逆引》中，“牛肉”“羊肉”“猪肉”作词单出，“桂圆肉”也作词单出。从方便外国读者的角度看，“牛肉”“羊肉”“猪肉”单出，带上英文译文，是可以的，但不可深究，两个自由词的组合（“牛”加“肉”，“羊”加“肉”…），意义没变就看作为单词，那么，天鹅肉、野鸡肉、孢子肉等也都该看成词了。但是，辩论的对方提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羊毛”不也单出词条，注“羊的毛，…”又是何意？难道就不对应着出“兔毛”“牛毛”和其他什么毛吗？

很好，请继续争论，争论就是促进。几本词典的差异，就是互相促进的例证。

逆引词典也称逆序词典、倒排词典和倒序词典，它按词从尾至头的顺序进行编排。可以想象，这样排列出来的词表，对于那些与词的音尾或形尾的研究有关的学科是多么重要。中国人相当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编出了综合性的韵府和按某种结构的字（如联绵字）的韵部归排的辞书。外国语言工作者在倒序词典（reverse dictionary）方面，也作出了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按过去某

些人的说法，印欧语系的词之所以容易分类，就因为一看词的尾巴(形尾)就知道是动词，还是名词或形容词。形尾在某些印欧语中，的确比较有规律。但千万不要笼而统之的谈，更不能武断。就拿俄语动词的尾巴-ть来说，够规律的了，但苏联的倒序词典告诉我们，异类潜入的现象绝非个别，随便翻一翻，就能见到кровать(床)、плеть(鞭子)、зять(女婿)等不少名词也用这个尾巴。又如，-ой一般说来是形容词的尾巴，但бой是名词，而домой 又是副词。

由此可见，倒序词典在形尾方面可以给我们许多知识。一部好的完整的倒序词典，可以让我们在议论某些语言现象时少说许多错话。

汉语的倒序词典，作用应更大些。因为真正可称为汉语词汇形尾的东西不多，象“子”和“儿”。“头”比“子”和“儿”要实一些，“面”“者”“手”“师”“化”“性”等更实一些，“科”“处”“局”“法”等更是一般实义词，不能叫作后缀什么的，不能与某些外语类比。斯瓦希里语一类的语言，词的前部多为语法(形态)的东西，后部是实义部分；土耳其语一类的语言则相反，词的尾部多为语法的東西，前边是实义部分；而俄语在这一方面近似土耳其语。汉语怎么样呢？前部(词头或前缀)虚的很少，只有“阿”“老”可算，“第”“初”其实都不能称为完全的词头；后部(词尾或后缀)虚的也不算太多，只有上面谈到的“子”、“儿”等可数的一些(当然，带“子”的都列全了，数目也相当可观)。汉语因共同语、方言和文字发展的状况特异，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或词组绝大多数是前后(或前、中、后)都有实义的，当然有强弱之分；有的只是一个部分有实义，另一部分实义已隐去，或已变化——不过一碰上爱说俏皮话的人，隐去的那一部分往往又被突出出来，使听的人耳目一新。《汉英逆引》和《现汉逆序》可惜都没有作这样一个统计：实义在前有多少，在后有多少，并重有多少，前重后轻有多少，前轻后重有多少，等等。《汉英逆引》附“构词力强的逆引带头字(牵引

十条以上者)”一表，是一种补救。

各语言的倒序词目，当然不收变格和变位后的那许多种形态（如果那样作，十几万个词目可以翻上十多番），《汉英逆引》的“着”只收“本着”等，“们”只收“我们”等，“了”只收“除了”等，很有道理。因为这些词尾（如“们”）或助词（如“了”“着”等）到底同“者”这样的词尾或“而已”这样的助词不同，“者”类是可以收尽的，而“们”类是不能收尽的。

如果从汉字编码、信息处理、编制机器语言、印刷自动排版以及了解现代使用的汉字的组词能力、出现环境、使用频率、语音变化，或者查检韵脚等方面去考虑，单有逆序词目（不带义项译释）也许就可以了。遗憾的是，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因为“词”未定下来，词目表就只有参考价值，没有权威性，它提供的东西不能作最后根据。《俄语反序词典》(Обрат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莫斯科, 1974)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列词目125,000个，每个词目都标明出自Б、У、О或М。Б代表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苏联科学院, 十七卷本；У代表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乌沙科夫主编), 四卷本；О代表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奥热果夫编)；М代表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苏联科学院, 四卷本。就是说，某个词或在某一部词典中收列或在这四部词典中都有收列。有这四部（尤其是Б、У 和М三部）权威词典作后盾，排逆序时只列词目不加译释是完全可以的，读者想知道义项及例释，请查БУОМ。而我们的逆序词目暂时还作不到“请查××××”那一步。

《汉英逆引》针对这一情况，从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角度出发，加上简明扼要的英译，这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汉字排在一起，摩肩接踵，外国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分割出词儿来，只查顺序，有时查不到，《汉英逆引》就提供了另一方便途径——查尾部，而且尾部归总，在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眼中，这可是极占分量的一项工作。有

名的 Jos. Mullie 在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非常注意这一问题，讲汉语实词名词时，曾举“～生，～手，～夫，～人，～匠，～界，～信，～长(zhǎng)”等一大堆；讲形容词时也列过“～巴，～实，～糊”等等。当然，Mullie 不可能列全，即使现在那两本逆序、逆引，也不算列全，但确实比以前顺序词典所提供的词汇知识丰富完整多了。这样的词典立刻可以告诉我们，“生”可以是双音或多音名词的后一部分，也可以是某些双音动词的后一部分。手头没有这样一部词典，上课时外国学生若问这样的问题，教师就有可能作出片面的回答。

话又说回来了。既然逆引词目并不同某一本或几本权威性的顺序词典互见，那么，带某种外语译释的倒序词典让查阅者去找哪一本顺序词典作它的补充呢？没有这样一本作它补充的顺序词典。已有的顺序词典的收词范围、服务对象等都不可能与它一致。这样看来，有必要出一部综合的汉外双解三序词典（顺序、倒序、中序，谓之三序）。按中序排，指的是：多于两个音节的词或词组，一头一尾已由顺序和倒序解决了，中间这一个或几个词素（或语素）有时大有讲究，为了科研和教学的目的，也应排列出来，同顺、倒两序形成三足鼎立的架势。

还有一个联想，就是：真正按音序（顺序与倒序）排列的，是不是应以音素为准，而不是以字为准（以字为准的，继续存在，继续改进），试验编写按音素排列的词典。国外已有这种类型的汉外顺序小词典，这主要是为那些听了中国话，想知道外语含义的人编写的，对于我们这些懂汉语又识汉字的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倒序更不可理解，怎么能在“人家 rénjiā”和“人家 rénjiā”之间，夹进 -jiā、-jiǎ、-jià 那么多音，而且汉字又全不相同的。不过，让我们替一个不懂汉话，不会汉字而想学汉语、听汉话的人想一想，这种严格按语素的音序而不是按字的音序排列的词典，对他们是多么具有吸引力！而这一试验，对于确定词的界线和分词儿写话，又

是多么重要的一步。顺便说一句，我在读这部虽以字为准、但较严格按读音编排的《汉英逆引》时，稍带还查出《现代汉语词典》几版中都保留着的一个问题：“糢糊”的“糊”标轻声hu，而音节表中不见hu(轻声)。既然音节表中列shang(衣裳)和si(茅厕)等轻声音节，就没有理由不列轻声hu。《汉英逆引》按实际读音在轻声hu下收七个词目，除“糢糊”、“浆糊”重出，也有六个之多。

谁都明白，在具体处理某些条目时，总会出现一些可以研究的问题，例如《汉英逆引》划动宾词组的标准似欠统一，“触网”划成chú=wǎng，为动宾，很好；而同一页的“拦网”却标“(动)”。这一类的问题，各部词典几乎都存在，这也是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的宝贵材料。

最后，好几部词典在“说明”中讲到注音使用隔音符号的问题时，大都有一句：“如果音节的概念(《简明汉英》等词典依照《汉语拼音方案》，使用“界限”两字)发生混淆(时)”。其实，不管概念也好，界限也好，这一句是多余的。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以a o 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就用隔音符号隔开。pí'ǎo(皮袄)，dá'àn(答案)，mù'óu(木偶)如此，ēn'ài(恩爱)，huáng'àn(磺胺)，míng'é(名额)也如此。《现代汉语词典·凡例三》注音中的第16段，没有必要分为a和b两项，更没有必要讲前一音节收-n尾或-ng尾的问题。有隔音符号为“名额 míng'é”，没有这个符号的必然是mín || gē，作为规律，这本是不必重复申明的。

编纂大型专科辞典的可贵探索

罗 禹

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哲学大辞典》，由冯契教授主编，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大型哲学辞典。该辞典预定的规模为词目13,000条左右，字数5,000,000上下。先按学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包括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六卷出版，然后增删修订汇编，出版合订本。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中国哲学史卷，正在排校的有逻辑学卷，即将发排的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卷，其余各卷的编纂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哲学大辞典》的出版，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辞书事业的发展都是一个贡献。它反映了我国哲学科学的水平，并将推动哲学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知识的普及。已经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卷，在1986年举行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9—1985)评奖中荣获著作奖。1986年10月，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的有关专家学者应邀集会，对该卷作评审鉴定。参加的有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理事)，萧萐父(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方克立(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罗竹风(上海市社联主席)，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该卷是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其主要优点是：广采博收，力求完备，比以往的有关辞书扩大了信息量；从